

关于提高“西方经济学”课程 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

曾令秋¹, 杜伟²

(1. 四川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2.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要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注重“四个分清”,即分清西方经济学中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西方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界限、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经济学中起作用的理论及政策主张所需条件与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的界限。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三个问题;四个分清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128-04

由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方法、理论、政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而教学计划的安排一般都是政治经济学在先,西方经济学在后,加上中学阶段对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学习和生活中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接触,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耳熟能详,必然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政策主张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是非,再加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庞杂性,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颇感吃力。为此,要提高“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做到讲清“三个问题”、划清“四个界限”。

一 关于讲清“三个问题”

在“三个问题”中,首先要让学生全面、准确、客观地了解西方经济学“是什么”,即对每种理论、每种方法、每一个政策主张、每一个代表人物的观点都

应全面介绍,而不能断章取义、一知半解。比如,关于斯密的生产劳动论,因为马克思曾说过斯密有“两个生产劳动论”,即一个是生产利润的劳动,一个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我们的教材就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样介绍并且断章取义地引证斯密的原话,似乎这是铁板钉钉,不可动摇。然而引导学生通过全面地去阅读斯密的原著[1](303—304页),便会发现,所谓斯密的两个生产劳动论的论述出自同一自然段中的两句话,是在论述同一问题时的两个层次,即同一个生产劳动论的两个方面——生产物质产品是生产劳动的自然前提或一般条件,生产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社会规定或特殊条件。这就说明斯密从未提出过所谓两个生产劳动,而是前后一贯的只有一个生产劳动论。马克思说斯密有两个生产劳动论,也不能只从字面去理解。马克思说斯密有两个生产劳动论,同时又说这两个生产劳动论的关系是:

收稿日期:2001-03-18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新世纪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西部院校经济学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及人才培养手段的创新”,批准文号:川教高(2001)36号。

作者简介:曾令秋(1958—),男,四川资中县人,四川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杜伟(1973—),男,四川雅安市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第二个定义是第一个定义的“补充定义”，可见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定义”，而是同一个定义的两个方面。从马克思本人的生产劳动论也可以佐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劳动也是从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这两个方面去建立生产劳动论，这正说明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论是借鉴了斯密的理论。

如果仅仅让学生知道“是什么”，还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了“是什么”，只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让学生了解“为什么”，即一个理论、一种方法、一条政策主张为什么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由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提出，如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格局应尽量通过市场的力量让“优胜劣汰”的原则贯彻到底，即便贫富差距再大也无所谓。而30年代后，凯恩斯则认为社会的贫富差别过大会危及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应通过减税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分配手段来使贫富差距缩小[2]。如果仅让学生学习至此为止，知道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在30年代前后不同，即知道了凯恩斯这方面的政策主张“是什么”，远不能使学生了解社会经济的变化对经济理论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策主张的决定性影响（即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是社会经济现实的反应并为经济运行服务）。因此，还必须讲清凯恩斯的主张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在30年代前，凯恩斯并不认为贫富差距太大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30年代后，凯恩斯则认为贫富差距太大使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贫富差距太大会危及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在30年代以后，凯恩斯提出了“均平富”的主张以刺激有效需求并缓解危机。这样学生便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

知道“是什么”及“为什么”并非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因此，在此基础上还得给学生进一步分析“怎么样”，即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政策主张的是非，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政策主张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可以为我所用，哪些不能为我所用，能为我所用的东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等等。这又和如何处理好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借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而要处理好批判与借鉴的关系又必须做到“四个分清”。

二 关于做到“四个分清”

其一，要划清西方经济学中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一方面要看到，西方经济学随人们对经济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认识工具在不断多样化。同时，不要忽视其理论在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时难免包含的庸俗成份。因此，对这两者要正确把握。

在教学研究中，常常容易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其相联系的分析方法混为一谈。比如，从19世纪末直至当代，西方经济学广泛应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就是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来说，边际效用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物，它以主观代替客观，否认价值是由劳动所创造，而认为价值是消费者对物品效用的心理感受所带来，这就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但从研究工具的角度看，边际分析方法是一种增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对确定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是一个有效的认识工具。尽管它以许多假定为前提，比如，它只能在技术不变、生产要素一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然而，这种假定或抽象又有它的根据，因为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源尽管从长远看是变化的，但它们也并非瞬息万变，在一定时限中，它们基本是不变的，因而这是一种合理抽象。作为一种方法，可以为我所用。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要么人浮于事、员工过多、停工待料，人不能尽其才；要么物资积压，物不能尽其用。因而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提出了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运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对经济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按照边际分析法得出的边际投入产出原理，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综合调配，在技术发达的部门、地区、企业，实行技术密集型生产，避免人多窝工；在技术落后的部门、地区、企业则实行劳动密集型生产，避免物质资源的浪费。

又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等“规律”，是根据主体心理活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总结出来的。在这些“规律”中，各种经济关系主要被心理因素所取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根源被归纳为人们的主观心理活动，于是乎，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过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各种矛盾的解决似乎只需要通过调整人们的心理状态就可以解决。这种理论的辩护性和庸俗性也非常明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明在经济研究中，心理分析是不必要的。相反，

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内,心理分析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活动过程,除受客观经济条件、社会政治环境的决定外,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心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在局部和短期内有可能受心理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经济政策的宣传或制定改革方案时,应考虑它可能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预期效应。如果使人们产生的期望过高,欲速而不达时,则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政策宣传,对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需要充分重视的,以有准备地采取措施解决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应。

在西方经济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应注意把其中有一定价值的分析方法与使用这类方法得出的结论区分开来。因为方法本身的可用与否与某人某阶级用某种工具得出的结论的正确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其二,要划清西方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和生产力理论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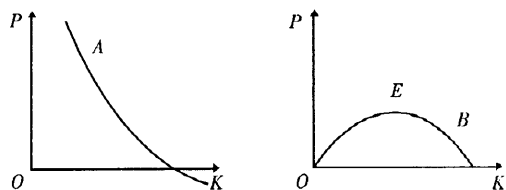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虽然相辅相成,共处于矛盾统一体中,但这二者各有自身的规定性,不能混同。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和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亦复如此。然而,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二者往往不加区别地交织在一起,使初学者难以识别,使浅尝辄止者难辨是非。因此,在教学、研究中就很有必要对二者有意识地加以区分。如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西方经济学中,它既被用来说明地租的来源,以解释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又被用来说明农业生产中,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投入与农产品产出的关系。如果用此“规律”来说明地租的合理性,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主、资本家与工人的“合作”关系,那显然是错误的。若进一步用它来说明地租的提高是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那更是荒谬的。但是它却客观地表明了,在农业生产中,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资,它所容纳的劳动量有一定限度,当达到这一限度再连续追加投入,每追加的单位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甚至可能为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论述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的面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

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3](880页)级差地租Ⅱ虽不是由土地肥力所带来,但是在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收益却是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却否认这一客观存在,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搞无限度密植,结果产出不敷投入,增产不增收,甚至于无收。所以,合理密植、科学施肥不能当着口号,而是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推而广之,社会各生产部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达到一定限度,其带来的收入都会呈递减状,都是因为收入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西方经济学往往就是这样,同一个理论既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的问题,又用来解释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同一个理论,如果用来解释后一类问题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用来说明前一类问题,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能用同一理论加以说明。

其三,要划清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的理论,真知灼见不鲜见,但谬误也不少,对其也要认真辨析。如前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使是用来说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只揭示了这种关系的一半,还有一半被忽视了。因为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追加某种资源的投入,就会使收益递减。因此,经济生活中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的同时,还存在着收益递增的规律。比如,当在一块土地上投资过少的情况下(或种植太稀、或施肥太少、或投工不足等),追加投入,肯定会使收益递增。认识这一点的意义在于说明生产中存在一个最佳投入点,这个最佳点就是单位投入的产量最大点,如果投入没有达到这一点,会使单位追加投入的收益递增,刚好达到这一点,效益为最好。所以,特定要素的单位收益不是如下图中的曲线A,而是如曲线B,E为最佳投入点:



其四,应划清西方经济学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起作用的应用理论及政策主张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

一切规律要现实地起作用都要一定的时空条件,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应用性很强的理论,尤有必要阐述清楚它的前提,否则就只能是一知半解。比如,在介绍收益递减规律对投入产出关系的正确揭示时,必须同时阐明它所包含的前提——技术不变,资源一定(尽管这种假定有其合理性),一旦把技术和资源作为变量考虑,情形就可能完全相反。又比如,所谓“乘数原理”,如果抽象地分析投资—收入效应和投资—就业效应,确实一笔投资可以带来成倍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和成倍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乘数“奇迹”的出现,要有许多条件,比如国民经济中各相关部门的供求信息要十分准确和及时,一级部门为次级部门提供的资金和物质资源。因此,“乘数原理”要变成现实,就必须满足以上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而现实生活中,这些条件往往是难以满足的。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政策主张,也同样要弄清其生效的条件。只有在搞清了

政策效应所需条件以后,才能比照我国实际,说明有否借鉴某一措施的条件以及怎样借鉴。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也应弄清有效利用它所需要的相关条件,否则,用起来也只能是生搬硬套。经济学中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只是分析问题的工具,对它的有效使用还在于有正确的理论前提,否则,方法再好,得出的结论也会悖理。如西方经济学中时兴的数量分析法,它确实是分析经济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效工具,而且,用它来阐述问题可以收到简捷、精确、易懂之效。然而,它本身却不能为经济范畴作界定,使用它时,要有先决条件,即经济范畴的内涵已被确定,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已清楚,否则,数学公式再高深也说明不了问题。 $1+1=2$,这在数学上是成立的,但在经济生活中就未必如此,如果将两个性质不同、且不能转换的东西加起来,硬用数学方程来说明其正确,那更是荒唐。这就说明,经济学中,数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不可偏废,而且前者要以后者为基础和依据。

参考文献:

- [1]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2] 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3]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of Western Economics

ZENG Ling-qiu¹; Du Wei²

(1. Economics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2. Economic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of western economics, we must solve “three questions” of “what”, “why” and “how”, and draw “four lines of demarcation” in western economics, that is, demarcation between vulgar economic theories and their analytic methods, between theori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ductive forces,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between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theories and policies’ functions and whether there are these condi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economics; three problems; four lines of demarcation

[责任编辑:王永政]